

靳辉明
罗文东
著

人道主义 与

现代化

Rendaozhuyi
Yu
Xiandaihua

安徽人民出版社

人道主义 与

现代化

靳辉明
罗文东
著



安徽人民出版社

036703

3

责任编辑:杨威海

白 明

装帧设计:丁 明

人道主义与现代化

靳辉明 罗文东 著

出版发行: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邮编:230063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合肥永青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字数:25 万

版次:1997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212-01436-2/D·236

定价:16.00 元

印数:00001—05000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导 论 塑造中国现代意识的重大课题.....	(1)
第一章 人道主义的总体考察	(13)
第一节 人道主义的历史演进	(13)
一、14—19 世纪人道主义发展诸阶段	(14)
二、19 世纪以来人本主义演进诸流派	(19)
三、19 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人道主义诸形态	(25)
第二节 人道主义的理论分析	(31)
一、人道主义概念的形成和演变	(31)
二、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	(36)
三、人道主义的本质特征	(47)
第三节 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	(54)
一、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批判	(55)
二、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继承	(61)
三、马克思主义对人道主义的超越	(66)
第二章 人道主义与西方现代化	(72)
第一节 西方现代化的思想先导	(73)
一、人道主义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批判	(73)
二、人道主义对现代人格的塑造	(79)
三、人道主义对现代社会理想的设立	(84)
第二节 西方现代社会危机的思想根源	(90)
一、人与自然的对抗	(91)
二、人与社会的冲突	(95)
三、人与人自身的异化	(100)

第三节 西方现代哲学对人道主义的批判	(107)
一、人本主义思潮对传统人道主义的批判	(108)
二、科学主义思潮对人道主义的批判	(115)
第三章 人道主义与中国现代化	(124)
第一节 中国早期人道主义和现代化的萌动	(124)
一、明清时期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	(124)
二、明清时期人道主义思想对现代化的影响	(134)
第二节 中国近代人道主义和现代化的曲折演进	(139)
一、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人道主义及其现代化的梦想	(139)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人道主义及其现代化的探索	(147)
第三节 中国当代人道主义和现代化的双重变奏	(155)
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人道主义与现代化的历史转折	(155)
二、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辟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创立	(163)
第四章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当代人道主义的新形态	(169)
第一节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现实基础	(169)
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产生的社会条件	(169)
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提出的理论根据	(175)
第二节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基本内涵	(182)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想目标	(184)
二、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	(188)
三、现代社会主义的行为准则	(192)
第三节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现实意义	(198)
一、推动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198)
二、促进国际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203)
第五章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中国现代意识	(208)
第一节 跨世纪的主题:从传统观念转向现代意识	(208)
一、中国现代意识的萌发	(209)
二、中国现代意识的形成	(217)
三、中国现代意识的发展	(224)
第二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审视	(229)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现代意识的冲突	(230)

二、新儒学与现代意识的偏差	(246)
第三节 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科学辨析	(256)
一、西方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区别	(257)
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对立	(268)
第四节 创建中国现代意识的必由之路	(274)
一、中国现代意识的来源与格局	(275)
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中国现代意识中的地位	(286)
第六章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294)
第一节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中的重要地位	(295)
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本质及其优越性的体现	(295)
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	(297)
第二节 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	(301)
一、宣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清除封建主义遗毒	(303)
二、宣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	(306)
三、宣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克服市场经济的消极影响	(310)
第三节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实践相结合	(317)
一、发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树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	(318)
二、弘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塑造现代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	(324)
三、提倡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确立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329)
后 记	(335)

导 论

塑造中国现代意识的重大课题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相继出现了研究、讨论人道主义问题和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的热潮。这既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在人们头脑中的强烈折光。

众所周知,人们对人自身的认识以及关于人的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始终占有重要地位。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开始探索人自身的奥秘和人在世界中的地位。据文献记载,建于三千多年前的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就出现过这样一句石刻铭文:“认识你自己!”这条言简意赅,朴实无华的箴言,表达了人类探讨属人世界的雄心,启发了从古至今无数哲人的智慧。古希腊著名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也许是第一个自觉按照德尔斐箴言研究哲学的人。他通过“建筑自己”和“认识自己”发现了一个伟大的真理:斗争是万物之父、万物之王,它使一些人成为神,一些人成为自由人,另一些人成为奴隶。他把德尔斐箴言同灵魂净化说结合起来,总结希腊人的历史经验,号召人们用战斗创造自己的未来。古希腊著名智者普罗泰戈拉明确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① 这句哲学名言表达了以人

^① 柏拉图:《泰阿泰德篇》,《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138 页。

的主观感受衡量事物的思想观念。这样一来,重要的问题就不只是认识自然,而首要的是研究人事。在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就注重研究人性、人道等人的问题,并提出了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恶论等各种各样关于人的学说。孔子所谓“仁者人也”,“仁者爱人”;^① 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② 等观点,都是古代中国人对人类本性以及人在世界中的地位的认识成果。

西方近现代哲学更加重视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并形成了关于人性、人的本质、人的自由和平等、人的价值和尊严等等全面而又系统的人学理论。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道主义、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潮,都可以看作是西方资产阶级人学发展的几个阶段或形态。这些关于人的学说不仅是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基石。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在其《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一书中开宗明义地说:“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戴尔菲城神庙里唯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③ 被西方学术界公认为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恩斯特·卡西尔,在其《人论》一书的开篇就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探究的最高目标——这看来是众所公认的。在各种不同哲学流派之间的一切争论中,这个目标始终未被改变和动摇过,它已被证明是阿基米德点,是一切思潮的牢固而不可动摇的中心。即使连最极端的怀疑论思想家也从不否认认识自我的可能性和必要性。”^④ 当然,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以抽象的人为中心,以抽象的人性为出发点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不可能形成科学的“人

① 孔子:《论语》。

② 孟子:《孟子·尽心上》。

③ 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62页。

④ 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

学”，不可能科学说明人类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作为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研究人的问题，关心人类的命运，而且在吸收和改造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尤其是资本主义时代人道主义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揭示人和世界的本质联系与普遍规律，解决人类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实现无产阶级以及全人类的解放，奠定了科学基础，指明了现实道路和美好前景。19世纪90年代初，意大利人卡内帕请求恩格斯为即将出版的《新纪元》周刊写一段题词，以便用精炼的语言表达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以区别于但丁所说的“一些人统治，另一些人受苦难”的旧纪元。恩格斯在回信中写道：“我打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给您寻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题词。马克思是当代唯一能够和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相提并论的社会主义者。但是，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 20世纪初，列宁在制订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纲领时，坚持要把《共产党宣言》这个重要原理写进党纲中去。他指出：“如果说‘由整个社会承担’（因为这既包括计划性又指出计划的执行者），不仅满足社会成员的需要，而且保证社会全体成员的充分福利和自由的全面发展，这会更明确些。”^② 早在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也多次庄严而又豪迈地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的雄心壮志和行动纲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

^① 恩格斯：《致朱·卡内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版，第189页。

^② 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的文献》，《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版，第218页。

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①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要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② 从实质上看，马克思主义是真正关心人，科学研究人的学说，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是最能保障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和幸福，最适合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马克思主义并不存在什么“人学的空场”，更不是什么“非人主义”。社会主义与所谓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也是根本不相容的。

无须讳言，由于“左”的错误思潮的影响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束缚，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社会主义实践曾经出现过忽视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和自由民主权利，压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能动性、主体性和首创精神的严重弊端。尤其是在十年“文革”期间，我们对“人学”、“人道主义”等重大理论问题作了简单化、片面化的理解，给人的问题的研究设置禁区，把批判抽象人性论变成反对任何意义上的人道主义，甚至连革命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也不宣传了。人性、人道主义问题被斥责为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的东西，遭到了简单、粗暴的批判；任何个人欲望、个人利益、个性自由都在“突出政治”、“斗私批修”的旗号下，受到忽视和排斥；阶级斗争的扩大化，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使许多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残酷的迫害。所

^①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63页。

^②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029—1030页。

有这些理论和实践的偏差,不仅败坏了马克思主义的声誉,阻碍了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同时也给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诬蔑、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提供了借口。

然而,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必然要纠正历史的偏差,最终会使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一个时期被轻视、被压抑的东西,会以另一个时期受重视、受弘扬得到补偿。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冲破个人崇拜、“两个凡是”的束缚,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的极左思潮,重新建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与此同时,我们党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左”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在这种社会历史条件下,一方面,伴随着人们对“文化大革命”惨痛教训的反思和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长期受到压制的关于人、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迅速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研究、争论的对象。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出现了一种右的思潮,把西方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抽象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引入到我国思想界,并用这些观点去总结历史,探索现实,说什么马克思主义不重视人,不研究人,社会主义是异化的社会,不人道等等,造成了人们思想的极大混乱。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在对现实问题的研究中,也确实产生一些离开马克思主义方向的情况。有一些同志热衷于谈论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所谓异化,他们的兴趣不在批评资本主义而在批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一个理论问题和道德问题,当然是可以和需要研究讨论的。但是人道主义有各式各样,我们应当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在革命年代我们叫革命人道主义),批评资产阶级的人

道主义。”^① 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的激烈争论指明了方向。这场争论从主要方面来讲,一方面是批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另一方面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人、人性、人的价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特别是着重研究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78年到1983年底这段时间里,报刊、杂志、文集中探讨人性、人的本质、人道主义和异化等问题的文章,就有700多篇,后来,一大批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价值、人权等方面的论文、专著甚至丛书也相继问世。全国性的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主体性问题、价值观和人生观问题、人权问题以及人学理论的座谈会、研讨会也多次召开。诚如有些人所说,中国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研究、讨论人道主义和人学的热潮。这股热潮大致经过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80年到1984年,全国兴起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这场论争涉及面很广,最具代表性的,比较集中的问题有:一是关于什么是人性?有没有普遍的、共同的人性?二是关于什么是人道主义?有没有超阶级、超历史的“广义的人道主义”或“一般的人道主义”?三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是什么关系?要不要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四是关于什么是异化?有没有社会主义的异化?这场争论在反思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摧残人性、践踏人性等不人道现象的历史教训;抵制抽象人性论、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宣传和实行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等方面都取得了积极成果。人们初步认识到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马克思主义也应加强对这个长期忽视的领域的研究。一些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工作者已经开始进一步研究人的本质、价值和主体性以及人的发展等根本性的人学问题。然而,这场争论毕竟是初始性的,许多人局限于对社会生活中的反人道

^① 邓小平:《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1页。

现象作情感上的评价和道义上的谴责,对人性、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取得一定的成果,但还没有完全展开和深化,对人的发展学说、对人学基本理论更不可能作全方位的、深入系统的研究。

第二阶段:从1985年到1991年,人道主义和人学的研究、讨论逐步深化和具体化。这期间关于人的问题的探讨主要是围绕以下三个热点展开的:一是关于什么是人的价值?我们应当确立什么样的现代价值观念?二是关于什么是人的主体性?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怎样发挥人们作为主体的积极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三是关于什么是人权?我们应当怎样保护广大劳动人民的基本人权,并且从事国际人权领域里的合作与斗争?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和人权曾经是西方人道主义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我们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在批判地继承历史上人道主义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赋予这些问题以新的时代特征和理论内容,使其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在价值观问题上,批判了过去那些为生产而生产,否定个人的利益和需要,把人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等错误观点,认识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的社会价值与自我价值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也是一致的。我们应当按照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在主体性问题上,反思了“文化大革命”对人的主体性的损害、践踏和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对人的主体性的束缚、压制,认识到主客体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充分发挥人的主体性的基本原则。在人权问题上,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探讨人权的含义、实质和发展规律,批驳西方资产阶级人权理论中的错误观点;既抵制西方大国的“人权外交”,维护国家主权,又积极参加国际人权活动,保障和促进基本人权,建立和平共处、平等互利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然而,有些人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研究、探讨的过程中,大肆宣扬个人主义价值观、唯心主义主体观,附和西方资产阶级的

人权论。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只有依靠坚持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方法,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和“双百”方针,对人的价值、人的主体性和人权等一系列人学基本问题作全面深入的研究、探讨才能克服。

第三阶段:从1992年至今,我国开始对人的问题和人道主义进行综合研究,并为建立一门相对独立的“人学”学科作准备。这是因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对人道主义和人的问题进行多年的探讨之后,普遍意识到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认为有必要建立一门综合研究人的“人学”学科或“人的哲学”,对人本身的存在和发展作深入系统的理论探讨。前几年有关人的问题的研究,也为人学的创立准备了主客观条件:一是涌现出一批以人学命名的学术研究成果。例如袁贵仁主编的《人的哲学》,黄楠森等主编的《人学辞典》,韩庆祥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发微》等等;二是申报人学研究课题。黄楠森、靳辉明、高清海、夏甄陶、王锐生、陈志尚等专家学者都获得过国家项目的人学研究课题。三是组建人学研究机构。1991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成立了“人学研究中心”,现在正筹建全国性的人学学会。四是多次召开人学理论研讨会,确定人学研究的对象、内容、范围、结构、意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有的专家提出,所谓人学就是以人这一特殊的社会存在物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生存和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作为人学研究对象的人是总体的人。人学是一门处于人的哲学与人的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或交叉学科。人学体系可以包括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智慧、人的活动方式、人的发展趋向等理论要素。当代人学研究 with 18、19 世纪的人学不同,必须着力探讨当前的人类困境以及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人的问题,以提高我们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自觉性,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能否认,我国的人道主义和人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研究队伍薄弱,研究机构不健

全,人学理论体系还未形成,但只要我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密切联系实际,就能够不断推进人道主义和人学的研究,并充分发挥其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和促进作用。

80年代中期,我国还兴起了研究文化问题的热潮。究其原因,一是社会主义体制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必然要求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之相适应。改革是一场全面而又深刻的革命,不仅要引起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变革,而且要引起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要使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变革,又必须以相应的文化变革和文化现代化为前提。尤其是随着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特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情操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由此形成的新思想、新观念与传统的思想文化发生了冲突,迫切要求我们消除传统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创立适应商品经济发展要求的现代意识。二是由于实行对外开放,扩大中外文化交流,西方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思想文化纷纷引进和传入我国,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促使人们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中一切对我们有价值的因素,丰富和发展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这些社会历史条件和原因的汇集,促成了80年代的“文化热”。

据不完全统计,仅1985年至1986年公开发表的研究文化问题的论著,就有200多篇、部,比1949年至1979年间出版的文化研究论著的总和还要多。从文化研究人员的分布来看,既有国内大陆上老一代专家和中青年学者,也有港台学者和外籍华人,还有热衷于中国文化研究的西方“汉学家”,从而使这场“文化热”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文化研究的阵容和盛况来看,一些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纷纷成立文化研究的机构和团体,如“中国思想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中心”等等;文化研究刊物如雨

后春笋大批涌现,如《中国文化研究集刊》、《国学集刊》、《中国近代文化问题》、《东西方文化研究》、《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等,几家有影响的出版社也争相推出文化研究丛书,如《中国文化丛书》、《中华近代文化史丛书》、《现代思想文化译丛》、《文化哲学丛书》等等;全国不少报刊都开辟过专栏,对文化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如“文化论坛”,“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外文化研究”等等;全国各地先后召开了各种类型的有关文化问题的座谈会、讨论会,如“中国文化史研究者座谈会”、“中国近代文化史讨论会”、“全国东西方文化比较讨论会”、“首届国际中国文化学术讨论会”等等。在这些文化研究人员、机构和出版单位的推动下,很快形成了重视和加强文化研究的热潮。

从总体上看,这次“文化热”主要涉及如下几方面的问题:一是关于文化的定义、对象、结构、范围等文化基本理论;二是关于中西文化各自的特点和优劣的文化比较研究;三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影响和发展规律的批判性反思;四是围绕中国文化现代化这个核心问题,探讨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五四时期,首先是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同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发生冲突,继而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并与资本主义文化发生冲突,所以当时的中西文化具有全面的对抗性。80年代的中国尽管经济上还比较落后,政治体制很不完善,但从本质上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优越的,社会主义文化也比资本主义文化先进,并善于吸收人类历史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这就决定了现时代中西文化关系的主导方面是互相交流,而不是互相对抗。这次“文化热”取得的巨大成果和产生的广泛影响,也有利于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和相互交流,加快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进程。

我们也必须看到,这次“文化热”对中西方文化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讨论还是短暂的、初步的,已发表的某些观点和见解,并不

是悉心研究的结果,而是一时主观臆断的产物。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某些同志受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变相地或赤裸裸地宣扬民族虚无主义和“全盘西化”论。他们批评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基本原则是“中庸观点”,是离开“系统整体立场”的“零散评价”,主张“全力动摇、瓦解、震荡和清除旧传统”,“摆脱中国文化的传统形态”,“根本改变和彻底重建中国文化”,甚至要“把西方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上层建筑统统搬到中国来”。我们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密切联系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全面深入地探讨中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发展规律及其相互关系,抵制文化研究热潮中出现的以“儒学复兴”论为代表的传统文化保守主义和以“全盘西化”论为代表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等错误倾向,才能顺利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深厚的文化基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总而言之,我国 70 年代末以来出现的有关人道主义和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的讨论,都不是偶然发生的,纯粹理学性的,而是在中国现代化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大背景下发生的,是关于如何对待西方现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创立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中国现代意识等重大问题的论争。这项庞大而又复杂的理论工程虽然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但讨论中提出的许多根本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完满解决,亟待当今乃至下一个世纪的理论工作者作出进一步的探讨。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我们应该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发展对外文化交流。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但是,属于文化领域的东西,一定要用马克思主